

Newsletter of
Internatinai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 / 郝春文

2011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所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11

2011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2011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劃

郝春文

主編

陳大為

副主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所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8. 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2011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 郝春文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325 - 5946 - 6

I. ①2…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學—叢刊 IV. ①K870.6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25165 號

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

項目編號:T0404

責任編輯:曾曉紅

封面設計:何 暘

2011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郝春文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啟東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12.5 插頁 4 字數 215,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0

ISBN 978 - 7 - 5325 - 5946 - 6

K · 1396 定價: 39.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2011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目錄

學術綜述

- 1995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1)
2010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董大學(20)
俄藏敦煌文獻研究述評 楊寶玉 陳麗萍(46)
敦煌壁畫“胡旋舞”是非研究之述評 胡同慶 王義芝(68)

會議介紹

- 2010 年“兩岸四地佛教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 陳大為(83)

紀念文

- 段文傑先生生平 敦煌研究院(84)
段文傑先生年表 趙聲良(86)
段文傑論著目錄 趙聲良 劉 波 李燕暉(92)
緬懷吳其昱先生 柴劍虹(98)
九三年的吳其昱先生 府憲展(103)
吳其昱先生論著目錄 鄭阿財 朱鳳玉 李燕暉等(112)
植根巴蜀, 抉微三學——龍晦先生學術成就述評 王斌(117)

出版信息

- 書訊五則 陳大為(122)

論文

- 韋孝謏墓誌考補 鄭炳林 吳炯炯(125)

論著目錄

- 1995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宋雪春(136)

2010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董大學(152)
俄藏敦煌文獻研究論著目錄(1918—2010 年)	陳麗萍 楊寶玉(174)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192)

1995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首都師範大學)

1995 年度中國大陸地區共出版敦煌學專著 50 餘部,公開發表各類相關論文近 300 篇。現將本年度敦煌學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分爲概說、歷史地理、社會、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學術動態與紀念文、書評與書序等十三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 說

本年度敦煌學研究概括性論著主要涉及敦煌文獻的研究、敦煌文獻的影印和整理、文書流散與收藏、敦煌學的現狀以及敦煌學人的介紹與表彰等方面。

敦煌文獻的研究,周丕顯《敦煌文獻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簡要介紹了敦煌文獻的內容,包括 13 篇敦煌文獻研究方面的論文和 5 篇有關兩漢、元代以及清代歷史的論述文章。鄭炳林主編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收錄論文 38 篇,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從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的優秀成果的展現。

敦煌文獻的影印和整理工作在本年度取得新的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1—2 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4 冊)和《俄藏敦煌文獻》(5 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12、13、14)共三卷。

敦煌文書流散與收藏研究,有張國剛、榮新江的《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敦煌經卷小記》(《祝賀胡如雷教授七十壽辰中國古史論叢》),該文對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圖書館所藏三件敦煌經卷進行了輯錄和考釋。榮新江《英倫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敦煌學輯刊》2 期)公佈了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對該館所藏的多文種寫本進行介紹,並對該館所藏敦煌寫本的編號給予說明。此外,他撰有《俄藏敦煌西域文獻紀略》(《學術集林》卷四)、《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敦煌文獻考察紀略》(《敦煌研究》4 期)兩文,前文對俄藏敦煌西域文獻的來源、館藏狀況、整理和研究以及出版情況進行說明;後文依照原藏者獲取原卷的時間順序,對日本天理圖書館中的敦煌文獻進行了考察。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三)》(《敦煌研究》4 期)梳理了日本國會圖

書館藏古寫本、大東紀念文庫藏敦煌寫經、東京大學東洋文庫研究所收藏之敦煌寫經，並附有日本三家藏經的後記。楊銘《楊增新等所藏兩件吐魯番敦煌寫經》（《西域研究》2 期）對重慶市博物館所藏的敦煌吐魯番漢文寫經進行了考訂。李際寧《味青齋敦煌秘笈佚卷存目點勘及其價值》（《敦煌學輯刊》1 期）對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保存的《味青齋敦煌秘笈佚卷存目》的大部分寫卷進行了點勘，為研究敦煌遺書流散史提供了一些新資料。

敦煌學的現狀研究方面，朱政惠《敦煌學發展的三大態勢——當代中國史學趨勢研究之三》（《學術月刊》9 期）指出敦煌學具有研究工作機制日臻完備、研究體系趨於完善、國內敦煌學研究融入國際敦煌學的三大發展趨勢。郝春文《八十年代以來北京地區敦煌學研究發展狀況》（《敦煌研究（特刊）》）介紹了 80 年代以來北京地區敦煌學的發展狀況。張金泉《浙江敦煌學研究》（《古文獻研究》）指出浙江學者為開拓和發展敦煌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對於敦煌學人的介紹與表彰，崔富辛、周明初《姜亮夫先生談治學（“我與敦煌學”）》（《古文獻研究》）述說了姜亮夫先生從事敦煌學研究的方法和治學經驗。劉詩平《不負國寶，襄進學術——榮新江教授的敦煌學與唐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5 期）高度評價了榮新江教授在敦煌學與唐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趙和平《學貫東西，博約兼長——周一良教授的中古史與世界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5 期）讚揚了周一良先生在研究敦煌書儀、唐代俗講和佛經寫卷等方面的卓越成績。胡曉明《饒宗頤的治學態度與方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6 期）讚揚饒宗頤先生在治學上具有敬意與憂患、積微精神、踏勘精神、重視目錄學和語言學、學問與藝事相融合等五方面的優秀品質。施萍婷《敦煌遺書編目雜記二則》（《敦煌吐魯番研究》）談論到“康有為與敦煌寫經”的淵源，考訂了“壬寅閏四月”敦煌卷子的年代應為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歲（877）。

二、歷史地理

敦煌歷史地理方面，李并成所著《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書，概述了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對匈奴統治時期和兩漢河西地區的行政和軍事建置進行了調查考證。王炳華《今年新疆考古所見唐代重要史跡》（《唐研究》）對巴里坤縣大河古城、銀山道、唐拔達嶺和唐代尼壤等新疆考古所見的唐代重要史跡進行了考察。馬雅倫《關於〈苦峪城斷碑〉的年代》（《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所謂苦峪城唐碑即《新唐書·張守珪傳》所載其“刻石紀事”之碑。鄭炳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異名考》（《敦煌研究》2 期）認為金鞍山即龍勒山，是今阿爾金山，它是唐五代著名的深山，也是張承奉建立

西漢金山國之“金山”。陳國燦的《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認為以敦煌為中心的四出道路在唐代雖有一些調整變化,但仍然起着中西交通的樞紐作用。鄭炳林《〈沙州伊州地志〉所反映的幾個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沙州伊州地志》是研究沙州、伊州歷史地理的中國資料,而且為中西交通和民族遷徙提供了新的線索。鄭炳林《唐五代敦煌新開道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參照敦煌文書資料對新開道的開設背景、走向及前後朝代道路對應關係、唐五代使用情況進行考證。李正宇《〈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劄記(二)》(《敦煌研究》4 期)對敦煌文書 P. 2005 涉及的“孟授渠”、“北府渠”、“大井澤”和“蒲昌海”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析。張令瑄《稀見河西方志校讀記》(《敦煌學輯刊》1 期)擇摘《三隴方志見知錄》的河西各縣縣志進行釋讀,有助於推進絲路歷史的研究。

政治史方面,吳震《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辨》(《西域研究》1 期)認為敦煌吐魯番寫本佛經中的“甘露”年號是指高昌地區政權的自建年號。向羣《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所見唐官文書“行判”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3 期)通過分析今年新出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官文書材料,來探討唐代早期地方行判制度的若干問題。雷聞《從 S. 11287 看唐代論事敕書的成立過程》(《唐研究》)對敦煌文書 S. 11287 中的相關人物進行了考訂,對論事敕書的成立過程和幾個問題進行了梳理和探討。殷光明《北涼緣禾、太緣年號及相關問題之辨析》(《敦煌研究》4 期)對史籍無載的北涼緣禾、太緣兩個年號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辨析。李方《唐西州長官編年考證——西州官吏考證(一)》(《敦煌吐魯番研究》)依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出土文書和相關論著討論了 26 任西州長官,並對西州長官編年進行了考證。王素《麴氏高昌“義和政變”補說》(《敦煌吐魯番研究》)對於麴氏高昌時代“義和政變”的發生原因、性質、起始時間以及政變集團的構成等問題進行了考論。樓勁《伯 2819 號殘卷所載公式令對於研究唐代政制的價值》(《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伯 2819 號殘卷不僅提供了探索唐代尚書令內部結構的線索,也提供了揭示尚書省演變趨勢的線索。華林甫《〈姓氏錄〉寫作年代考》(《敦煌研究》4 期)認為敦煌文書北圖 8418 號(位字 79 號)《姓氏錄》當寫成於唐天寶元年(742)之後、寶應元年(762)之前的二十年內。榮新江的《張氏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關係》(《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梳理了 9 世紀後半至 10 世紀初沙州歸義軍與西州回鶻之間交往與戰爭相交錯的關係史,並對有爭議的問題提出看法。陸慶夫《五涼政權與中西交通》(《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五涼政權所在的西北地方是絲路交通的樞紐,是中西文化的交匯處。陸慶夫《關於王玄策史跡研究的幾點商榷》(《敦煌研究》4 期)與孫修身

《唐朝傑出外交活動家王玄策史跡研究》中的幾處不同觀點進行商榷。余太山所著《兩漢魏晉南北朝中原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全面梳理了漢魏南北朝時期中原與西域關係相關的原始史料。樓勁《漢唐的外事體制與絲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敦煌學輯刊》1期)、《漢唐對絲路上一般對外交往的管理》(《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分別探討了漢唐的外事體制及其指導思想以及漢唐絲綢之路上的基本外交模式,闡述了漢唐對絲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張俊民《“縣泉置元康四年正月盡十二月丁卯雞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2期)反映了以縣泉置為代表的漢代郵驛系統的日常生活情況,並探討了它同以“勞邊冊”為代表的漢塞系統的差別。馮培紅《有關敦煌文書的兩則讀書劄記》(《敦煌學輯刊》2期)對“張議潮究竟有無收復西州”和“P. 3715 號《致大夫狀》年代考”兩個問題進行了細緻的考證。

軍事方面,楊銘、何甯生《曹(Tshar)——吐蕃統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級基層兵制》(《西域研究》2期)認為吐蕃沿襲唐朝基層兵制“曹”這一建制是吐蕃受唐朝政治、軍事及經濟制度之影響的結果。鄭炳林、馮培紅《唐五代歸義軍政權對外關係中的使頭一職》(《敦煌學輯刊》1期)根據敦煌文書中歸義軍對外通使情況的記載,對使頭一職作了設置背景、職責許可權及其作用的考析。楊銘《吐蕃時期河隴軍政機構設置考》(《中亞學刊》4輯)結合漢藏文材料,認為吐蕃河隴地區主要采取了軍政合一的所謂“節度使”制。孟彥弘《唐前的兵制與邊防》(《唐研究》)認為唐代的終身化、地方化的兵制取代了漢魏以來軍隊的職業化和國家化。王進玉《敦煌壁畫中的軍事內容》(《敦煌文史資料選輯》)認為敦煌石窟藝術是一幅中古時期連續千年的兵器圖譜。李正宇《敦煌郡的邊塞長城及烽警系統》(《敦煌研究》2期)梳理了長城沿綫之外散在郡境的數百座烽臺遺址,通過其井然有序的排列揭示其特有的功能。

法律方面,董念清《魏律略論》(《敦煌學輯刊》2期)認為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文書對於研究魏晉南北朝法律制度,尤其是《魏律》的篇目和特點具有重要意義。齊陳駿《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法律文化資料簡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介紹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古絲路上的法律文化資料。

經濟方面,程喜霖《唐代過所與胡漢商人貿易》(《西域研究》1期)認為西州是唐代開拓西域的基地,是長安通往西域絲綢之路的要衝,形成了西疆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鄭炳林《唐代敦煌種植業研究》(《中國史研究》3期)認為唐代敦煌種植業主要分佈在甘泉水灌溉區域的各村莊,以私人園圃種植業為主。王進玉《敦煌壁畫中的農業生產工具》(《敦煌文史資料選輯》)對敦煌壁畫農作圖中的農業生產工具進行介紹。他的《敦煌古代酒帳與西北少數民族

渾脫酒》(《陽關》5 期)認為敦煌遺書之《酒帳》所記載的“渾脫酒”就是西北少數民族所飲的馬乳酒。閻國權《從莫高窟壁畫看敦煌商業》(《敦煌文史資料選輯》)通過壁畫展示出敦煌在古絲綢之路上的商業重鎮地位。楊俊《敦煌清代糧倉》(《絲綢之路》5 期)介紹了敦煌城南保存的八座清代糧倉的歷史和現狀。盧向前對於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研究包括《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三》(《唐研究》)、《部田及其授受額之我見——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四》(《敦煌吐魯番研究》),前文圍繞着《授田簿》,對唐代西州官府對土地的管理方式進行了探討;後文認為唐代西州的部田及其授受額是唐代努力實行“均田制”的縮影。榮新江《〈唐開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縣南平鄉籍〉殘卷研究》(《西域研究》1 期)對《唐開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縣南平鄉籍》進行初步整理,從文書的外形與內容、時間和地點進行探討,並對兩條可能與之相關的資料進行了討論。張尚謙、張萍《敦煌古代戶籍殘卷研究》(《雲南教育學院學報》3 期)分析了西涼戶籍編製的內容與形式,並和文獻記載進行了互證,有許多新的結論。劉惠琴《從敦煌文書看沙州紡織業》(《敦煌學輯刊》2 期)從敦煌文書窺探唐宋時期敦煌紡織業的狀況,分析了這一時期出現的紡織及其生產用度情況,對於研究敦煌地區的經濟狀況有所裨益。

三、社 會

利用敦煌文書研究社會文化的論著,主要涉及書儀、民俗、社邑、學校教育、交通工具等方面。

周一良、趙和平合著的《唐五代書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唐五代書儀的類型、源流、演變進行綜合性、個案性研究。謝生保《敦煌民俗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收錄數篇對於敦煌民俗研究的相關論述,對於敦煌民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李金梅、劉傳緒、李重申《敦煌傳統文化與武術》(《敦煌研究》2 期)通過狩獵、祭禮、舞蹈、軍事、敦煌文學、戲曲以及壁畫等方面與武術的關係,剖析了敦煌傳統文化對武術的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首都師範大學學報》6 期)指出喪葬互助不僅是敦煌社邑經濟和生活互助的最重要內容,也是敦煌社邑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學校教育方面,周谷平《敦煌出土文書與唐代教育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3 期),依據敦煌出土文書所提供的資料,探討了唐代地方教育和蒙學教育的發展狀況。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學校部分教學檔案簡介》(《敦煌學輯刊》2 期)通過對唐五代歸義軍時期使用的幾種教學教材、教案進行分析,從教學檔案的角度探討了敦煌藏經洞遺存的教育類文書中許多違反常規的現象

和問題。周丕顯《敦煌“童蒙”、“家訓”寫本之考察》(《敦煌文獻研究》)對《李氏蒙求》、《新集文詞九經抄》、《太公家教》等“童蒙”、“家訓”寫本進行了考察。

交通工具方面,馬德《敦煌壁畫交通工具史述論》(《敦煌研究》1期)、《敦煌壁畫交通工具史料述論(下)》(《敦煌研究》3期)通過研究敦煌壁畫中的古代車輛、舟船資料,探討了我國古代交通工具的製造和使用的歷史。

四、宗 教

本年度敦煌宗教研究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方面。

敦煌佛教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方面,主要的成果有方廣錫《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宗教文化出版社)對漢文大藏經之外的佛教文獻進行分類整理和研究。王書慶《敦煌佛學·佛事編》(甘肅民族出版社)收集了敦煌遺書中七八十篇有關各種佛事活動的文體,包括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發展史中的全部內容。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主編的《敦煌佛教文獻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收錄七篇佛教文獻研究論文。

佛經及其注疏的研究,方廣錫《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及其注疏》(分載《新疆文物》1期、《世界宗教研究》1期)對現藏國內外的敦煌《金剛經》及其注疏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與介紹,並指出它們對於研究佛教寫經、敦煌歷史、雕版印刷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他的《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宗教》1期)介紹了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以及十五部關於《維摩詰經》的注疏。方廣錫、許培玲《敦煌經帙》(《敦煌學輯刊》1期)以藏經洞出土的若干帙皮以及關於經帙的一些資料,來揭示古代僧人的藏經方式和書籍管理度藏制度。

佛教史方面,杜斗城《北涼譯經論》(甘肅文化出版社)收錄其七篇文章,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敦煌的佛教和佛教史進行了深入探討。李玉昆《敦煌遺書〈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是研究禪宗史和泉州佛教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王書慶《從敦煌文獻看敦煌佛教文化與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社科縱橫編輯部編印《敦煌佛教文化研究》)認為敦煌佛教文化在長期的中轉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以中原佛教文化和西域佛教文化兼而有之的文明類型。王惠民《獨煞神與獨煞神堂考》(《敦煌研究》1期)認為“獨煞神”即千手千眼觀音,“獨煞”即觀音之于閩語、藏語的音譯,探討了于闐與西藏佛教對敦煌佛教的影響。楊森《金山國與各教的疏密關係》認為金山國在短暫的國運中,其成功與失敗與僧人有着密切的聯繫。陳國光《釋“和尚”——兼談中印文化交流初期西域佛教的作用》

(《西域研究》2 期)認為古代“西域”在初期中印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橋樑作用,而且當時西域佛教也是漢傳佛教的重要來源之一。王惠民《古代印度賓頭盧信仰的產生及其東傳》(《敦煌學輯刊》1 期)以敦煌遺書中的《請賓頭盧疏》為例說明請賓頭盧事儀有一定的規範,賓頭盧信仰有一定的規模。

莫高窟與佛教寺院的研究,馬德《莫高窟與敦煌佛教教團》(《敦煌吐魯番研究》)認為莫高窟是敦煌佛教教團的禪修之地,敦煌佛教教團在莫高窟所從事的各種佛教活動是僧俗共建的、圓融各宗各派的、社會化和世俗化的“入世佛教”。同氏《敦煌的世族與莫高窟》(《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以敦煌世家大族為主體所譜寫的莫高窟歷史就是一部佛教中國化、社會化的歷史,是一部對佛教進行改造和利用的歷史。李德龍《敦煌遺書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財產世俗化》(《山西大學學報》2 期)論證了寺院的實際經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佛教的清規戒律,寺院經濟與世俗封建經濟趨於同步,世俗化程度進一步加強。

道教研究方面,主要有朱越利所著的《道經總論》(遼寧教育出版社),論述了道經的起源、產生與發展,介紹了道經的分類、目錄及敦煌道經、藏外道經等內容。萬毅《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試探》(《唐研究》)認為通過探析《昇玄內教經》造作流行的年代和過程,可以窺測隨着南北朝時期國家統一趨勢的加強而出現的道教各派的融合趨勢。

對佛道關係的探討方面,顏廷亮《關於〈白雀歌〉見在寫卷兼及敦煌佛道關係》(《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 期)認為在吐蕃統治時期,佛道兩教並非勢不兩立,而是和平共處。王惠民《敦煌“雙履傳說”與“隻履圖”本源考》(《社科縱橫》4 期)認為中國佛教故事中還雜糅附益有中國道教故事。

對於祆教與摩尼教的研究,本年度所出的成果並不多。有代表性的為榮新江的《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國學研究》),該文從粟特文古信割看祆教傳入中國的年代最晚在西晉末葉。虞萬里《敦煌摩尼教〈下部讚〉寫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認為敦煌 S. 2659 寫本是《下部讚》在代宗、德宗年間的傳抄本。

五、語 言 文 字

俗字研究方面,張涌泉有一本著作和兩篇文章:《漢語俗字研究》(嶽麓書社)是第一部俗文字學的概論性著作,有力地推動了漢語俗字學和漢字學的發展;《敦煌文書類化字研究》(《敦煌研究》4 期)考察了敦煌文書中的字形類化現象,並提出了類化字研究的校勘學意義;《俗字探源錄——〈漢語大字典〉一、二卷校讀劄記》(《古文獻研究》)輯錄了《漢語大字典》一、二卷與俗字

辨析有關的條目。王平《敦煌歌辭“得”字研究》(《山東師大學報》1期)對敦煌歌辭運用頻率較高的“得”字的應用進行探討。施謝捷《敦煌變文語詞校釋劄記》(《敦煌吐魯番研究》)對《敦煌變文集》和《敦煌變文集補編》中的部分俗字、別字和語詞進行了校釋。

語法方面,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畢業論文,1995年6月)以《敦煌變文集》為基本材料,分析變文的語法事實,探討唐五代主要語法現象的共時差異和歷時變化。另外他的《敦煌變文遠指代詞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指出上古漢語產生的遠指代詞在頻率和用法上優於中古及近代漢語產生的遠指代詞;晚唐五代漢語遠指代詞有很大變化和發展,不同地域方言間的遠指代詞具有差異性。劉堅、蔣紹愚《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收錄以口語為基礎,而摻雜文言成分的作品,如唐人傳奇、唐五代禪宗語錄、變文,以及與變文性質相近的俗文學等。黃征《敦煌俗語法研究之一——句法篇》(《敦煌吐魯番研究》)對敦煌俗語法之糊塗句、緊縮句、倒裝句、鬆散句、插入語和襯字進行了舉例分析,考察了敦煌俗語法的運用。

六、文 學

文學綜論方面,本年度出版有一本專著,即吳庚舜、董乃斌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下)(人民文學出版社),論述了中唐、晚唐與五代文學的發展狀況,並系統地概述了敦煌莫高窟所出唐代俗文學作品。

願文和變文的研究。黃征、吳偉《敦煌願文集》(嶽麓書社)指出敦煌願文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學、史學、民俗學、語言學、文體學以及石窟建築、壁畫藝術等七個方面的價值。鄭炳林《敦煌本〈張淮深變文〉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張淮深變文》記載了張淮深征伐西桐等處回鶻的事件。

敦煌曲子詞的研究。劉尊明《千載不傳之秘籍:〈雲謠集〉》(《古典文學知識》1期)介紹和評述了《雲謠集》的校勘工作。劉尊明《敦煌歌辭、敦煌詞、民間詞與文人詞之考辨》(《湖北大學學報》2期)對敦煌寫卷歌辭從名稱、概念、內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進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周延良《敦煌情愛曲詞》(河北大學博士論文,1995年6月)分為“敦煌情愛曲詞校釋”和“論詞的起源”兩編,對敦煌遺書中的情愛曲詞進行校勘和注釋。周丕顯《敦煌俗曲分時聯章歌體再議》(《敦煌文獻研究》)敘述了敦煌俗曲中的分時聯章歌辭的產生、發展以及流變。劉尊明《唐五代敦煌民間詞的文化蘊含》(《湖北大學學報》5期)從內容題材方面發掘和探尋了敦煌民間詞中所包蘊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又從藝術表現方面考察分析了敦煌詞中所反映的民間文化特徵。邵文

實《敦煌邊塞文學之“征婦怨”作品述論》(《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在敦煌文書中,除了詩歌外,敦煌曲詞小調、敦煌民間講唱文學作品中都有征婦怨歌,說明“征婦怨”是當時的一種普遍情緒。

敦煌賦的研究。伏俊璉《論敦煌賦的表現特色》(趙逵夫主編《詩賦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指出敦煌賦具有兩個顯著特徵:文學表現上的極端主義和調侃詼諧性。江藍生《〈燕子賦〉(乙)校釋拾零》(《敦煌吐魯番研究》)對敦煌寫本《燕子賦》(乙種本)擇十數條進行了校釋。

詩歌方面,項楚《王梵志詩中的他人作品》(《敦煌吐魯番研究》)指出“王梵志詩”以集合許多白話詩人作品的詩集形式出現,在時代背景的作用下,“王梵志詩”在流行的過程中不斷得到擴充和豐富。張錫厚《敦煌本〈高適詩集〉考述》(《文獻》4 期)認為敦煌本《高適詩集》的整理研究,顯示了敦煌本高適集具有無可估量的文學文獻價值。徐俊《敦煌寫本唐人詩歌存佚互見綜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對敦煌寫本詩歌與《全唐詩》、《全唐詩補編》的重出互見詩人 80 家、詩作 329 首進行了甄辨,包括重出詩的查證和互見詩作者的考證。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 2555)〉新校》(《敦煌研究》3 期)對敦煌文書 P. 2555 的唐人詩文作品抄卷進行校錄,認為此卷是極其珍貴的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的原始資料。高國藩《敦煌本高適佚詩〈因書即事〉析論》(《南京大學學報》1 期)對敦煌石室遺書中發現的唐代詩人高適的佚詩《因書即事》進行研究和剖析,認為其詩表現了盛唐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柴劍虹《俄藏敦煌詩詞寫卷經眼錄(一)》(《敦煌吐魯番研究》)對作者經眼的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十個詩詞寫卷進行了作者、年代考訂和內容探析。鄭炳林《敦煌文書斯 373 號李存勖唐玄奘詩證誤》(《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敦煌文書 S. 373 號所抄詩並非唐玄奘所作,對其寫作年代及其相互關係等進行了證誤。周丕顯《敦煌佚詩雜考》(《敦煌文獻研究》)對一些敦煌佚詩進行考釋。王宗祥《〈景教創世頌〉(擬題)非宋人詩》(《敦煌研究》3 期)認為《景教創世頌》(擬題)並非宋人詩,所擬題也不合詩文內容,此詩實際抄自唐羅隱詩《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對於敦煌文學中的文體探討,有三篇文章。李明偉《敦煌文學中“敦煌文”的研究和分類評價》(《敦煌研究》4 期)對於敦煌文學中“敦煌文”的概念、分類範疇、分類研究以及幾種敦煌文學作品進行了研究。顏廷亮《敦煌西漢金山國文學的評價問題》(《甘肅社會科學》3 期)通過對敦煌西漢金山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三篇文章進行考析,闡釋金山國的文學評價問題。馬雅倫《關於南山文體的討論》(《敦煌學輯刊》2 期)通過五位學者對於“南山”研究結果的梳理,認為南山的統治中心在石城一帶,是多民族聚居的區域。

佛教文學作品在敦煌文獻中多有體現。張弓《唐代的釋門散文》(《唐研究》)認為釋門散文在散盛行駢衰的總體趨勢下,貫穿了整個唐朝。徐湘霖《論敦煌佛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期)認為敦煌佛曲由文人文學變異至通俗文學的趨勢體現了外來民族文化通俗化的過程。張涌泉《以父母十恩德為主題的佛教文學藝術作品探源——介紹一部珍貴的〈父母恩重經〉寫本》(《原學》)指出敦煌本《父母恩重經》的發現與整理使得民間流傳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的來源得到澄清。張先堂《S.4654〈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並序呈獻〉新校與初探》(《敦煌佛教文獻研究》)認為S.4654《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並序呈獻》是五代後周時一位佚名僧人西行求法途經敦煌逗留時所寫的一首七言律詩,透露出五代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社會的信息。徐俊《敦煌寫本〈山僧歌〉綴合與斯5692蝴蝶裝冊的還原》(《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認為斯5692蝴蝶裝冊的還原,不但使《山僧歌》等釋氏歌偈得以綴合完整,而且為早期書籍裝幀形式提供了一個實證。鄭炳林《關於〈諸山聖跡志〉的撰寫年代》(《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認為《諸山聖跡志》是後唐末年的一位西去印度取經的僧人留下的詩篇。

七、藝 術

大型圖冊包括: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藝術叢書》(江蘇美術出版社)展示了敦煌石窟的藝術風範。其中,趙聲良《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六一窟(五代)》認為莫高窟第六一窟為敦煌晚期藝術的碩果。李月伯《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一五六窟附第一六一窟(晚唐)》介紹了莫高窟第一五六窟、第一六一窟的內容及其藝術價值。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魏)》認為莫高窟第二八五窟為中西藝術的交匯點。楊雄《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二四九窟附第四三一窟(北魏、西魏)》認為莫高窟第二四九窟、第四三一窟為“中西同圖,疏密兼施”的代表。張元林《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〇窟(北魏)》認為莫高窟第二五四窟、第二六〇窟的藝術成就為“融合中印藝術,獨具風情特色”。

段文傑主編的《敦煌石窟鑒賞叢書》(第三輯)(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描繪了敦煌莫高窟卓越的藝術成就。其中,王惠民《運思精妙,神韻滿壁——莫高窟第四三一窟藝術鑒賞》(第一分冊)指出莫高窟第四三一窟是北魏洞窟;趙聲良《融貫東西,異彩紛呈——莫高窟第二八五窟的藝術》(第二分冊)指出莫高窟第二八五窟是西魏時期的洞窟;張艷梅《細密精緻而臻麗——莫高窟第四二〇窟藝術》(第四分冊)指出莫高窟第四二〇窟是隋朝時期洞窟;羅華慶《神異感應顯,史跡傳人間——莫高窟初唐第三二二窟》(第六分冊)指出莫

高窟第三二二窟是初唐洞窟；謝生保《丹青艷麗，可見唐風——莫高窟第九窟藝術特色》（第九分冊）指出莫高窟第九窟是晚唐洞窟。以上分冊皆對各窟的內容進行了文字和圖版的說明。

音樂方面，姜伯勤《敦煌“令舞”曲拍譜的再發現——兼論王朝“法度禮樂”與“歌酒樂舞曲”的消長》（《學術集林》卷五）通過對新整理出來的北圖殘卷 820 號敦煌譜本的考釋，推證此種譜本的功能，並通過此例論證五代前後王朝的法度禮樂和歌酒樂舞曲。邱星《敦煌石窟音樂簡說》（《音樂世界》12 期）簡要介紹了敦煌石窟發現的敦煌卷子譜。應有勤《論敦煌琵琶譜“掣”為急反撥》（《音樂藝術》3 期）通過唐代琵琶的撥法證明敦煌琵琶譜中的“、”既是掣號，同時也是一種具有時值意義的反撥號。台建羣《敦煌壁畫阮的研究》（《敦煌研究》1 期）通過敦煌壁畫中阮的形態、演奏形式以及在壁畫中的位置來考察阮的發展演變。鄭汝中《榆林第 3 窟千手觀音經變樂器圖》認為千手觀音經變樂器圖是民間樸素的音樂史料，是以現實為依據的形象寫照。

書法方面，沃興華《敦煌書法》（上海書店出版社）通過不同時期的書法圖錄，分析了敦煌書法的點畫、結體和章法，認為通過敦煌遺書材料能夠完整地描寫書法發展與演變的過程。馬建華、趙吳成《敦煌漢簡書法精選》（安徽美術出版社）對敦煌地區出土的漢簡的書法進行了正隸書體和章草書體的分類研究。鄭汝中、趙聲良《敦煌寫卷書法精選》（安徽美術出版社）對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數十個有代表性寫卷的書法進行了研究探討。段文傑主編的《敦煌書法庫》（第二、三輯）（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解析了隋唐以及高昌時期敦煌寫本書法的時代分期和類型。趙聲良《隋代敦煌寫本的書法藝術》（《敦煌研究》4 期）認為隋代對於寫經書法是個承上啓下的過渡時期，南北方的書法在這個時期廣泛地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王元軍《從敦煌佛經寫本看有關唐代寫經生及其書法藝術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1 期）探討了寫經卷子的抄經者及其抄經情況，揭示了佛教書法藝術的特質。楊森《敦煌 0010（1 號）〈佛說祝毒經〉書法風格——從北朝經生體書法談起》（《敦煌研究》1 期）認為《佛說祝毒經》寫本時間在漢晉之際，屬於帶篆書結構的綜勢隸筆的經生體早期作品。李新《我國古代最早的硬筆書法——敦煌莫高窟硬筆寫本》（《敦煌文史資料選輯》）簡要介紹了敦煌莫高窟硬筆寫本的特點和書體。牛汝極、楊富學《敦煌回鶻文書法藝術》（《甘肅民族研究》1 期）對敦煌回鶻文的書法形體和書法特點進行了論述。

塑像方面，穆紀光《敦煌菩薩塑像的文化意蘊》（《甘肅社會科學》4 期）揭示了不同時期人們塑造的敦煌菩薩像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蘊。賀世哲《莫高窟北朝五佛造像試釋》（《敦煌研究》3 期）認為莫高窟第 251、254、257、260、435、

437 等窟的五佛造像是如來五分法身像。孫修身、孫曉崗《從觀音造型談佛教中國化》(《敦煌研究》1 期)從觀音形象的考辨和觀世音造型女性化時間的考定,來說明女性觀音的定型是佛教世俗化和中國化的一個標誌。

壁畫方面,《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收錄了學術界有關石窟壁畫的優秀研究成果。其中,段文傑《玄奘取經圖研究》認為玄奘取經圖以《詩話》為藍本創作而成,表現了取經途中的艱險歷程和玄奘艱苦卓越的精神;趙聲良《莫高窟北周壁畫風格》認為莫高窟北壁風格是北周時期敦煌獨特環境的產物;寧強《曹議金夫婦出行禮佛圖研究》認為曹議金夫婦出行圖的主題是到莫高窟供養禮佛,是一幅以出行圖方式描繪的供養人像,具有紀念意義、政治意義和地方特色。謝生保主編的《敦煌壁畫白描精粹》(甘肅人民出版社)系列叢書,展示了敦煌壁畫白描的精粹。其中,趙吳成《敦煌樂伎》對北朝至五代宋元西夏的樂伎進行了分類概述,采用白描的手法再現敦煌樂伎的發展過程;吳榮鑒《敦煌飛天》認為敦煌飛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分析了采用白描的畫法展現敦煌飛天的發展和演變過程;趙俊榮《敦煌供養人》認為敦煌供養人畫是敦煌壁畫藝術中的主要內容之一,供養人畫像和供養人題記是不可分割的佛教藝術。

歐陽琳、史葦湘、史敦宇《敦煌圖案集》(上海書店)對自北魏至五代的圖案進行了分類剖析,認為敦煌石窟藝術以注重裝飾為其最大特點。范興儒《敦煌飛天》(甘肅文藝出版社)對“敦煌飛天”進行了彩繪出版。王宏、李映洲《敦煌繪畫藝術與跨世紀的中國畫形態》(《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敦煌繪畫藝術為中國畫現代形態的確立提供了“化石”般的生成信息。段文傑《供養人畫像與石窟》(《敦煌研究》3 期)通過介紹敦煌壁畫中的供養人畫像的五種分類和三個歷史發展階段,認為敦煌供養人畫像既是藝術也是歷史,是系統的藝術,是形象的歷史。暨遠志《中國早期佛教供養人服飾》(《敦煌研究》1 期)認為供養人服飾體現了不同階層的服飾等級,也具有深刻的時代特徵。敦煌研究院主編的《敦煌壁畫故事(第四輯)》(江蘇古籍出版社)收輯 16 則佛教神話故事,在內容和性質上包括佛傳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樊錦詩的《簡談佛教故事畫的民族化特色》(《敦煌研究》1 期)認為敦煌壁畫體現了佛教故事畫的民族化進程,對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史葦湘《從敦煌壁畫〈微妙比丘尼變〉看歷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敦煌研究》2 期)由敦煌壁畫《微妙比丘尼變》發掘出中國和印度、西域文化交流的痕跡,認為莫高窟蘊藏着中印古代文化藝術交流的豐富資料。姜伯勤《莫高窟說法圖中龍王與象王的圖像學研究——兼論有聯珠紋邊飾的一組說法圖中晚期犍陀羅派及粟特畫派的影響》(《敦煌吐魯番研究》)從圖像學角度追溯